

## 时代

时代论坛



## 不决定具体战争危险

□ 阎学通

一国的和平与战争政策不是由时代特征决定的，因为在任何时代都有战争，在同一时代各国面临的战争危险不同，即使一国在同一时代面临的战争危险也会变化。没有世界大战的时代并不意味着没有局部战争的危险，而进行局部战争也并不必然阻碍本国经济发展。因此，我国国防建设政策应依据国家安全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而不应被时代特征所局限。

## 任何时代都有战争

战争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人类一面谴责和反对战争，一面却又准备和进行战争，而且许多国家都花巨资修建了纪念本国取得战争胜利的纪念馆。在冷战结束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有国家都反对战争，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国家又都在不断地加强军备建设。从道义上讲，人们认为战争是灾难，但从利益上讲，人们又认为战争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

今天的现实是：世界上没有一天不在进行着战争。仅以1999年为例，世界上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共有40起（新发生的九起），卷入战争的国家有几十个。卷入战争的国家并非都是弱国、小国和穷国，其中很多是发达国家，美国更是不例外。自冷战结束后，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实力使美国的安全环境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这并没有使美国少卷入军事冲突或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2年的索马里战争、1994年的波黑战争、1998年的沙漠之狐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由此可见，无论冷战后的时代特征是什么，世界都不会因此没有战争。

现今的时代与列宁写“帝国主义论”时代相比较，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世界大战的危险小多了。然而，没有世界大战的危险并不等于没有局部战争危险。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来局部战争一天都没停止过。冷战后的局部战争频率是否低于冷战时期和列宁时期，这需要进行统计。即使冷战后的局部战争频率下降了，也维持在每年30起~40起之间，这个频率还不能证明局部战争的危险已经很小。

## 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战争危险不同

在同一个时代里，不同国家面临的战争危险是不一样的。在相同的大国际安全环境中，每个国家面临的小安全环境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卷入战争的危险较小，但有些国家则无法摆脱战争的困扰。

重读列宁有关时代的论述，笔者的心得是，列宁的“时代”概念包含了历史发展必然性和历史机遇两重涵义。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指“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恐惧、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5-436页）。然而列宁这个判断并不是



冷战结束了，局部冲突并未止息

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只是必然给无产阶级提供了进行革命战争的机遇，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同时也必然为资产阶级提供进行民主和民族独立战争的机遇。

列宁把当时的世界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第二部分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民族运动已发展起来的东欧、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和俄国等，第三部分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3-724页。毛泽东同志70年代的三个世界划分与列宁的三类国家划分有相似之处）。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为三类不同的国家里的革命战争提供了不同的机会。他认为，在第一类国家里，即“在西欧和美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同上，第716页）。在第二类国家里，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有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的机遇，而在第三类国家里，帝国主义战争主要是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战争提供了机遇（同上，第724页）。

以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运动提供机遇的方法思考时代问题，我们会发现，在冷战后的时代里，美国维护霸权的战争为不同国家所提供的机遇是不一样的。对于多数发达国家来讲，美国的人道主义军事干涉政策为他们提供了用战争维护自己政治利益的机遇；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则卷入抵抗外来军事干涉的潜在危险增长了；而对有些国家来讲，被迫进行抵抗外部军事干涉的战争成为了历史必然。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讨论冷战后的时代问题时，发现不同类型国家面临的战争危险差别很大。冷战后的世界和平并没有给所有国家提供分享和平红利的机会，许多国家仍饱尝战争之苦。刚果、苏丹、卢旺达、索马里、斯里兰卡、阿富汗、菲律宾等进行着长年不断的内战，以色列、叙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希腊、土耳其等时常进行领土和边界战争，俄罗斯、南斯拉夫等则被分离主义拖进战争。与此同时，由于没有世界战争的危险，一些军事强国更加无顾忌地以保护民主或人道主义为由发动战争。由此可见，冷战后的世界和平并不是对每个国家都是发展的机遇。

区别世界大战危险与局部战争危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不能只以是否有世界大战危险为依据来判断各国所面临的具体战争危险。因此在分析中国的安全环境影响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没有世界大战危险

台海危机：解放军进行登陆演习



并不等于中国就没有战争危险。自1945年以来，我国在没有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多次卷入战争。别国没有战争危险也不等中国没有战争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发达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比较小。然而，西方国家之间没有战争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如果中美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很可能组织多国部队，美国的一些军事盟友还会支持美国。

#### 同时代同一国家的战争危险也变化

不仅在同一时代里不同国家面临的战争危险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同一个时代所面临的战争危险也会发生变化。以中国为例，80年代初与80年代末中国所处的时代没有变化，但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使中苏关系正常化，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中国卷入战争的危险。相反的例子是俄国1994年出兵车臣时，其所处的时代特征与90年代初没有重大变化，但俄国却面临着不同的战争危险。

以列宁的战争政策为例。列宁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前就做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判断，但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于1918年3月与德国签署了具有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然而战争危险只解除了几个月，西方国家就对俄罗斯进行了军事干涉，于是列宁在同年7月只好又号召人民参军进行保卫祖国的战争，并在11月宣布《布列斯特和约》失效。

至于我国，冷战后面临的战争危险也是在不断变化的。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做出世界大战至少十年打不起来的判断，这一判断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小平同志的这一判断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更不是说20年~30年内都没有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如果我们认为自80年代初以来世界的时代特征没有变化，但自1983年以来，我国的安全环境的历史曲线却是一个马鞍形。1983年~1989年安

## 伊斯兰教

## 在东南亚

□ 翟坤

提起伊斯兰复兴运动,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中东。其实在东南亚地区也有着世界上1/5的穆斯林(超过两亿),那里伊斯兰复兴运动同样不能忽视。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两年多里,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政治影响力呈上升之势,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 合法势力问鼎政权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是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但近年来,合法的伊斯兰教政治势力对国家政局的影响越来越大。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接近2亿的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88%。1998年5月苏哈托下台后,印尼政党解禁,伊斯兰政党迅速崛起,成为与民族主义势力、军方势力三足鼎立的政治力量。在国会的11

个派系中,有5个派系是伊斯兰教政党,它们共拥有约1/3的议席,直接左右政局。印尼现任领导人瓦希德就具有深厚的伊斯兰背景。他出身伊斯兰教世家,曾是印尼第一大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主席和该党派领袖,统领4500万中下阶层会员。他不仅精通伊斯兰文化,而且是印尼民主运动的倡导者。而印尼第三号人物——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协商会议主席赖斯,曾是该国第二大穆斯林组织穆罕默德传教会主席,该组织有3000多万中产阶级的会员。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瓦希德靠着赖斯为首的“中间轴心力量”(伊斯兰教政党联盟)的支持,挤掉了呼声最高的民族主义改革派领袖梅嘉瓦蒂,当选总统。

在马来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8%,随着近年来马来西亚社会的逐渐伊斯兰化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加剧,伊斯兰党迅速崛起。在去年的国会大选中,该党一举获得马来人一半以上的选票,并夺得27个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反对党。该党的崛起使得马来社会走向分裂,对马哈蒂尔领导的执政党巫统构成“现实威胁”,马哈蒂尔长期引以为荣的“巫统等于马来人”的政治神话破灭。伊斯兰党以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为宗旨,其政策主张在国内引起“政教国”与“世俗国”之争。今年7月,雪兰莪州宗教局官员扣留了31名在歌厅娱乐的穆斯林,其中一位女歌星还以“侮辱伊斯兰教”的罪名被指控。此事惊动全国。副首相巴达威认为,宗教局不应扮演“道德警察”的角色,并澄清政府不会禁止穆斯林出入或在此类场所工作。舆论认为,下届2004年的国会大选,将是巫统的“世俗国”与伊斯兰党的“政教国”之争。

## 极端组织大搞恐怖

近期以来,东南亚的伊斯兰恐怖活动有上升趋势,而且还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首先,恐怖活动政治化。在印尼盛产香料的马鲁

全环境不断改善,1990年~1995年保持了最佳状态,1996年~2000年则呈下降趋势。1996年中美在台海发生军事对峙之前,几乎没有人认为台湾地区会发生军事冲突,1996年起人们开始讨论军事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今年台湾大选后,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何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一位台湾学者甚至说:“难怪部分台湾、美国和中共的重要学者都认为,现在两岸之间的问题不是打或不打的问题,而是大打、小打、早打、晚打的问题。”

## 战争并不完全排斥发展

目前在国内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就是谁进行战争谁的发展就必然受阻。然而仔细观察则可发现,

这个逻辑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发展过程。

如果进行战争就必然阻碍一国的发展,那么进行战争越多的国家,其经济就应越落后,战争进行越少的国家经济发展就应越快。然而,这个逻辑适用于长年进行内战的一些非洲国家,却不适用于总是以武力干涉他国的美国。20世纪初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候,美国仅是众多列强之一,并非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在这一个世纪中打了无数场战争之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不进行战争也不一定能发展。二是有时不进行战争就克服不了发展中的政治阻碍。1999年,俄罗斯如不采取坚决的战争手段消灭车臣的分离主义势力,国内的政治就会更加不稳定,恢复经

古省,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在极端伊斯兰组织的煽动下,几千名伊斯兰教“圣战者”手持大刀、长矛和自制枪械,开赴马鲁古,帮助该省的穆斯林兄弟打击基督徒。一年半以来,马鲁古省死于宗教暴力冲突的人数已超过4000人,流离失所的难民超过10万(也有说是20万)。马鲁古省的宗教暴力冲突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图谋推翻政府的政治势力介入其中。印尼前国防部长苏达索诺明确指出,苏哈托集团资助了这些极端组织,苏哈托的旧部下以及一些在军队改革中失势的军人参与了暴乱的策划,并偏袒穆斯林一方。

在菲律宾,不论是势力雄厚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还是狡猾狠毒的阿布沙耶夫组织,都以游击战和恐怖战作为反政府的主要手段。当被政府军打得丢了大本营时,他们就实施爆炸、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让社会不得安宁。菲律宾驻印尼大使在官邸前被炸断了双腿,两名平民不幸做了替死鬼。大使被炸案的原因虽未大白于天下,但舆论多认为,该事件与多起爆炸案是遥相呼应的,系“摩伊”采取的报复措施。

其次,恐怖活动邪教化。最近抢劫军火库的马来西亚极端伊斯兰组织“奥马乌纳”,实际上是宣扬“刀枪不入”的邪教。该邪教虽以“以圣战推翻现政府”为宗旨,但在互联网上却传播有违伊斯兰教义的邪说。该组织约有1000名会员,渗入马来西亚军方和政府,并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在马来西亚,类似的邪教组织至少有44个,其中有17个还在积极活动。

第三,恐怖活动国际化。阿布沙耶夫组织在马来西亚劫持21名国际人质,涉及7个国家,4个多月过去了,仍未完全解决。阿布沙耶夫策划该案,一方面是勒索高额赎金,另一方面是想使事件复杂化,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从而损害菲律宾的国际形象。该组织1992年一出道就以100个平民的鲜血换来了“极端恐怖分子”的恶名。它的近600名成员年轻好战,不少人

曾在中东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该组织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巴勒斯坦、黎巴嫩、苏丹、埃及的穆斯林极端势力及圣战组织关系密切,并接受他们的资助和训练。他们还与本·拉登过从甚密。

## 分离主义的大伊斯兰背景

东南亚一些国家长期存在的分离主义运动大都有伊斯兰背景。

在印尼的亚齐省,“自由亚齐运动”组织26年来一直试图以武装斗争来实现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梦想。该组织受东帝汶独立的鼓舞,并抓住新政府立足未稳的时机,大搞分裂活动。今年6月,该组织与政府签定了3个月的临时停火协议,但其主张与政府和谈的秘书长却遭暗杀。在印尼马鲁古省,极端伊斯兰教组织也打出建立“南马鲁古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

在菲律宾,穆斯林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主要为聚居在南部棉兰老岛地区的摩洛民族。1972年成立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掀起摩洛分离主义武装斗争。1978年从该组织分离出来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摩伊”)有1.5万名游击队员,是菲律宾最大的反政府武装。7月底,菲政府军攻克了“摩伊”大本营,但该组织首领萨拉玛却得以逃脱,并宣布“摩伊”将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对政府发动“圣战”。因劫持21名国际人质而名声大噪的阿布沙耶夫组织所属的苏禄族就是摩洛的一支。

目前,东南亚合法的伊斯兰教政治力量和非法的极端组织的影响都在扩大,但仍在政府的可控范围之内。在印尼,瓦希德总统坚持世俗国家的立场,不同意把伊斯兰教立为国教。在马来西亚,伊斯兰党若想通过修改宪法成立伊斯兰国家,需要国会2/3的多数支持,但该党在国会的议席还不到14%,因此短期内变更国家体制的可能性不大,但伊斯兰教和世俗力量的斗争将加剧。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伊斯兰分离运动和恐怖活动也将持续下去。▲

济的困难也就越大。

战争对于一国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还是起保障作用是依具体情况决定的。以英国为例,英国早期进行的殖民主义战争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海外原料和市场,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使英国走向衰败。比较我国自1949年以来卷入的战争,每场战争后的经济发展情况是不一样的。1953年结束的朝鲜战争、1962年的中印边界反击战与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我国的经济出现的是快速增长;而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和70年代初结束的越南战争之后,我国经济仍都处于衰落状况。不管怎样

解释这些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都难以说明战争必然阻碍每一个进行战争国家的发展。

现代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国防建设是国家整体发展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往往可以带动民品科技水平的提高,扩大军备建设有助于拉动购买力低迷的市场经济,军队停止经商有利于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之,无论现今的时代是什么,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从长远讲不利于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从近期讲不利于解决日益严重的台湾问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